

● 文学理论

蒙尘的“心”与解蔽之道

——试论夏目漱石的《心》与荀子思想的关系

吴 鲁 鄂

(武汉大学 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吴鲁鄂(1954-),女,山东宁阳人,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文学研究。

[摘要] 夏目漱石的晚期小说《心》形象地诠释了荀子的解蔽思想,指出只有在真诚的反思中敞开人生,在忏悔意识中批判自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同时也隐含着作者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批判和对国家前途和国民命运的担忧。这是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不断确认自我、反思自我、追求自我归宿心路历程的反映,是作品真实价值所在。

[关键词] 夏目漱石;《心》;解蔽思想

[中图分类号] I313.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1-0081-05

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夏目漱石(1867—1916)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其作品《我是猫》、《哥儿们》、《三四郎》、《心》等,在日本家喻户晓。对他早期的创作成就鲁迅先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他的作品“轻松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1](第572页)。晚年,现实生活中,他活跃在市民讲坛上,以犀利的眼光正视现实,以辛辣的口吻批判社会,表现出卓越超凡的时代认识能力;在作品中,他围绕近代自我问题揭露人性中的丑恶,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不朽篇章。现今,他的肖像印制在日圆纸币上,是日本公认的近代文坛领袖。

《心》是作者思想成熟、艺术水平达至顶峰阶段的代表作,1914年连载于《朝日新闻》,同年由岩波书店发行单行本。作品有一个寓意深刻的书名“心”,在初版的封面上,书名置放在一个醒目的长方形框内,其后有一段起首为“心 荀子 解蔽篇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的汉文。在日本高喊“脱亚入欧”,疾步赶超西洋的特殊时代,这种设计别具一格。意义不同寻常的是,这个设计亲自出自作者之手,而且是作者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尝试。这很自然地使读者将其与作品内涵联系起来,对作者的创作意图产生种种揣测。对此,日本漱石研究著名学者江藤淳曾发表过评论,他指出:“漱石在尝试装帧单行本时,显然有一种意图……与荀子的解蔽篇有密切的关联。”“带着荀子的人生观去读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恰如要用一种严密的方法去验证荀子的定理。”^[2](第120页)遗憾的是,江藤氏对作品与荀子思想的具体关联未做进一步探讨。

作品发表至今近一个世纪,日本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近代化历程。“认识者”^[3](第299页)夏目漱石在《心》中反映出的时代认识也受到了时代的检验,因此联系时代现实,进一步考察作品与荀子的关系,探讨其创作意图,对作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必然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一、人物性格与“性恶”之说

《心》在结构上由三部分组成,其中“先生”自杀前寄给“我”(一个大学生)的遗书是作品的核心部分。作品中,主人公“先生”生活在“脱亚入欧”的明治时代(1898~1912),是一个有知识不作用于社会,有家庭不养儿育女,有贤德之妻不去感受幸福的忧郁之士。他不仅对生活毫无热情,而且时常流露出一种对人的极端厌恶和彻底失望的情绪。让“我”深感不解的是,“先生”每月一次,一定去给一个友人扫墓,在那里静坐独思,直至接到他自杀前寄来的遗书,“我”才了解了其中的原由。原来,“先生”是一富家的独生子,在东京上学期间父母相继去世,财产被深得父亲信任的叔父吞噬,他因此不再相信任何人,变卖剩余家产,永久离开了故土。在东京,他借居于一个军人遗孀家里,房东母女亲人般的关爱使他恢复了对人的信任,并爱上了这家的独生女。这时,他为了帮助因叛逆养父母,生活异常拮据的儿时好友、大学同窗K,把K接来同住,从精神到物质给予了无私的援助。不久,受家庭温馨氛围的感染,禁欲主义者K同样对小姐萌发了爱意,并毫不顾及地在“先生”面前袒露了自己的恋情。“先生”为此万分苦恼,但利用K对自己的信任,一句话击中要害,一举获胜。可就在他成功地得到小姐婚许之时,K自杀身亡。他为此痛不欲生,陷入了无限的懊悔之中。直到宣告明治时代终结的钟声敲响,“先生”认为自己受明治时代影响太深,活着也会落后于时代,决定追K而去。

如果带着荀子的人生观来阅读作品,作品与荀子思想的类缘性显而易见。叔父不仁侵吞“先生”父母的遗产;K不义抢夺恩友所爱;“先生”背信获取“小姐”的婚许,都可以说是荀子最具代表性思想“性恶说”的再现。外表上,叔父的忠实可靠;K可以牺牲一切的求道精神;“先生”令人敬佩的无私奉献,一切都不过是“善”的外衣,一旦与个人利欲发生冲突,“善”的外衣就会剥去,显现出“恶”的本性。作品贯穿着这种对人之本性的透彻认知。起初“先生”对叔父的背信深感不解,说“平时都是善人,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恶棍了呢,真是可怕”。“人之不信”达到极点,可当他恢复了对人的信任,K的不义又给了他当头一棒,他称“K的魔杖一下子将我变成了一尊化石”。同样,“为了道,可以牺牲一切”的“禁欲主义者”K也有类似的痛苦经历。他看透亲生父母的自私,识破养父母的利己,他不相信任何人。当他得到“先生”的帮助再次恢复对人的信任,坦诚地道出心声时,这位好友却趁虚而入,这才使他彻底失望。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品人物性格的塑造深受荀子“性恶”说的导引。在荀子的时代,诸侯兼并,列国争雄,为了一个美女,甚至一块美玉,一个人会变成另一个人的豺狼;两千多年后,《心》的故事中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深渊。而且,作品中“先生”与K都是“受害者”,也都是“加害者”,人人都被“性恶”所缠绕,无法分身,无法逃遁。“性恶”作为人与之俱来的天性在这里被放大了,它不是某一个个体的属性,而是整体的“人”的本能。作品隐含着“人之性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的哲理。作品透过人物的思想行动告诉读者,所有的“人”都是不可信的,包括自己。因此“人之不信”是“人之性恶”的必然结果,二者紧密关联,相互映衬,造成了注定的悲剧结局。作者以遗书的形式,敞开自身,观照人的心灵深处,将人之本性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虽然认同荀子的“性恶”说,但并不只把它看做是一种人性现象,而是看做人物必然如此行动的内在动力,是人物性格形成的原始根据。这种对人之本性的透彻认知,是存在论者夏目漱石不间断地对人之存在进行探讨的一贯思想的反映,也是作者“从伦理者向认识者转变”^[3](第299页)的重要标志。

二、情节设计与“心”的蒙“蔽”

作者选用《荀子·解蔽篇》中的名句“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4](第325页)作为对书名“心”的注释。在荀子认识论中,“心”是主宰一切的“神明之主”。荀子认为,人们在认识方法上有一个通病,就是容易被事物的某一方面所蒙蔽,而这种“蔽”往往是招来灾祸的根源。要看清事物本来的面目,就得去

“蔽”，去“蔽”必须先认识“道”，而只有“出令而无所受令”的“心”才能认识“道”。虽然“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但只要“心”能“虚壹而静”，也就是不要因为对一事物的认识而妨害对另一事物的认识，就可以达到一种认识上的明彻。荀子把“心”比作盘中如镜的水面，端正放之，则能照见事物的原貌。如果微风吹拂，搅动了下面的污浊，水面就无法识别物体本来的面目了，这就是所谓的“心”之蒙尘。因此要保证自己能辨别是非曲直，真正认识世界，就得去除认识上的“蔽”，保证“心”不受外物的干扰，清澈沉静。

作品在情节构思上反映出作者对荀子认识论的认同。作品中，人物之间矛盾冲突都是因陷入认识上的误区所至。曾以“为求道可以牺牲一切”为人生信条的K无视恩友的情感，欲夺其至爱，是“蔽”于情欲而“暗”于道德之大理；曾无私地对K伸出援助之手的“先生”用不光彩的手段一举击败友人，是“蔽”于占有之欲而“暗于”仁义大理。K对小姐的温柔不能视而不见，所以不能将其求道之心贯穿始终；“先生”对朋友不能忍痛割爱，所以不能将其无私奉献持之以恒，是“心”未能保持“虚壹而静”所至。对“先生”与K来说，都是被“小姐”的爱这阵“微风”吹皱了心池，使“心”失去了正确认识事物的能力，走入认识的误区，“蔽”是罪恶的元凶。“先生”与K两者都是因“蔽之一曲”成为加害者，同时又都因对其“暗于大理”产生悔恨，成为可悲的受害者。

对情节的这种安排及人物性格的定型，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平野谦认为，《心》中的K和“先生”两个形象都是作者自身的投影，其性格前后截然不同的变化是典型的深受传统影响的明治知识分子同以“自我本位”作为精神支柱的留洋学生在思想文化上产生冲突的反映。“小姐”是“理想的日本”^[3]（第257页）的象征。基于这一见解，进一步探讨作品与“解蔽”之说的关联，不难看出作品独特构思的深刻含义。

我们知道，夏目漱石生活在日本社会急剧转型的明治时代，时代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自幼钟爱汉诗文，曾立志当一名汉学家，但明治时代“脱亚入欧”、疾步赶超西洋的时代大潮对他产生了巨大冲击，上大学时他选学了英文学专业。他是一个既为东方传统文化而心醉，又被西方先进而科学的文明所吸引的典型的“明治时代之子”。1903年留学英伦，但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本质上的差异，使他对英国文学产生本能的抵触，几乎造成精神错乱。在无尽的烦恼中，他抓住了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本位”意识，他说：“领悟了‘自我本位’，我变得坚强了。”^[6]（第445页）这种“自我本位”意识也是“独立、自主、唯我独尊”这一明治时代最时尚、最推崇的新精神。是这个时代精神使他克服了精神失常的危机。后来他应聘于《朝日新闻》报社，专门从事写作。现实生活中一方面他顺应时局，成为积极倡导西方文明的先驱者，另一方面传统的惯性又使他成为激进的“反近代（即反西洋）”^[7]（第149页）的急先锋。虽然他处在彷徨矛盾之中，身不由己的左右摇摆，但他并未茫然自失，而是在欧洲的近代思想与东方思想的交融中、碰撞中不断地确认自我、反思自我，苦苦地追寻着“自我”的归宿。

的确，从“先生”与K的身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的影子。他们都是既有东方文化深厚的根基，又接受了西方意识的知识分子。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是他们苦恼的根源，无可调和的双重性格导致了人生的悲剧。这是明治时代最为时尚的西方精神与传统的东方道德意识激烈碰撞的必然结果。作品中，“先生”说“我们受明治时代影响最深”，“如果是我，那就是为明治精神殉葬”，一语道破“明治精神”就是造成痛苦的根源。“先生”还说，“我是一个本来想走正直之路，却不小心滑了一跤的蠢人”，这也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为时代大潮左右，始终为自己精神上的矛盾和言行上悖逆而痛苦的真实写照。晚年，夏目漱石挥毫写下“则天去私”视为座右铭，这是对能到达“坐于室内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观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4]（第325页），也就是对“心”的“虚壹而静”这种最高境界的向往。这正是作品何以“心”命名的原因所在。

三、主题寓意与“解蔽”之说

遗书是作品的核心部分。遗书中作者以厚重的笔墨详细描写了“先生”痛彻入骨的悔恨、撕裂心肺般的痛苦。遗书中写到“先生”为自己违背伦理道德感到罪孽深重，他试图把自己的灵魂托摆在书本

里、沉浸在酒杯里或把自己忘掉,然而他做不到。他的痛苦非他人所能理解,他“常常感到好象这世界上只住着我一个人”,孤独至极。而且为自己错误理解 K 暗示将走自绝之路的“决心”二字懊悔不已,说:“本来,我还可以在这种惊愕之下,再公平地审视一遍,可悲的是,我竟一个心眼,只把这个词当作他要争取小姐的意思了。”对此“先生”悔恨交加,他说:“倘若这时有人走到我的身边,小声对我说:‘你真卑鄙!’也许在那一瞬间,我会猛然地清醒过来的。”他说“我的良心都象针扎一般难受。”“只要我还活着,便情愿每个月都跪在 K 的墓前重新忏悔。”“想到那埋在地下的白骨,心里不能不感到命运的讥讽。”K“黑幢幢的身影”无时无刻伴随着,纠缠着他,他只得“死去了般地活着”。这是对“心”之蒙尘所造成无可挽回后果的深刻反思,是对走入认识误区的痛切悔恨,这种痛苦的倾述给青年学生“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这种结果也许正是“先生”所期待的,他在遗书中还写到:我的过去造就了我这样一个人,现在我把这些只有我才能表述的人生经历真实地记录下来,以求有助于对人的了解,我的努力,对你也好,对其他人也好,我想决非是徒劳。”我们在这里可以了解到,在恨之深刻,苦之痛切的描写上如此这般地泼洒厚重笔墨,不过是作者力求用自己亲身的经历透彻解析人的本性,给后人一个警示。这时的“先生”颇像在“解蔽篇”中不厌其烦进行说教的荀子,告戒人们,要解除认识上的“蔽”,就要保持一个清醒认识世界万物的头脑。这一独具匠心的构思,表明了“先生”不愿看到自己“受蔽”悲剧的重演,希望下一代能“认真地从人性上吸取教训”。因此可以说这种试图解除“心”之“蔽”才是作者刻意策划的主题。

《心》是作者在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中追寻自我的一个总结,也是对自己所认识时代本质特征的一个概括。主人公与时代“一体化”的独特构思不仅使读者了解在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中知识分子为寻求“人之存在本来姿势”所付出的努力,也使读者对明治时代这样一个在日本历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特殊时代有一个透彻的认识。作品的创意不过是力求使读者在认识自己,认识时代上有了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目光。当然,不仅是认识自己,日本最近出版的《漱石 理不清的〈近代〉》^[8](第 38-39 页)一书中有一段精辟的见解。书中言道:“漱石作品中谈到的自己决非小‘我’,而是‘大我’。这个‘我’,这个‘自己’可以说意味着日本这一个国家,日本人这一个全体国民的群体。”漱石是一个“能将其‘个人’相对化,能站在更高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人”。因此,我们还可以说,夏目漱石在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并非仅指作者本人这样一个个体,而是指日本国这样的“大我”和“日本人全体国民”。作品指出的主人公的“心”之蒙尘,无疑也是针对日本国的。

《心》发表于 1914 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这是日本以明治维新(1867)为契机,打着“强兵富国”“展示国威”的大旗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发起和加入的第三次大的战争。我们知道,日本的近代史也是一部战争史、侵略史,明治时代的日本是一个执迷于侵略战争的国家。基于“大我”的视点,可以将《心》中为获得“幸福”,以不义的手段一举打败 K 的“先生”理解为为达到“富国”的目的而以“战争”手段侵占邻近他国领土的日本。作为日本国民,虽然是胜利者的一员,但对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说,这种非正义的战争留在心灵的创伤也是深刻的。作品中,“先生”悔恨交加地说,“在爱情上我虽然胜利了,可在做人上我彻底失败了。”“先生”还说,“婚后,我的幸福却拖着一条黑影。我想,这幸福大概正是把我引向那可悲命运的导火索吧。”这可以说是对当时日本“蔽”于“富国”利欲之“一曲”而“暗”于人间正义和平之“大理”的反思,是对在天皇制下一味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的批判。作品设置主人公自杀的悲惨结局,这可以说是对日本侵略罪行采取的一种自裁行为,是对当时利欲熏心,沉浸在战争胜利喜悦之中的日本国民整体发出的警告。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夏目漱石对国家前途和对国民命运的忧虑。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惨败,当那些毁灭性的灾难降临之时,人们不会不想起夏目漱石的谆谆告诫。战败后,日本放弃了战争,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现在虽然仍有一些“蔽之一曲,暗于大理”的军国主义分子蠢蠢欲动,可喜的是在日本曾遭冷遇的《心》已成为高中国语教材名著之首选^[8](第 2 页),作品的魅力得到充分展示、价值得到广泛认可,如长鸣的警钟《心》超越时空获得了永生。

[参 考 文 献]

[1]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10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 [日] 江藤淳. 夏目漱石: 第3卷[M]. 日本东京: 有斐阁, 1983.
- [3] [日] 近代文学研究事典[J]. 国文学, 1987, (增刊).
- [4] 荀况. 荀子[M]. 沈阳: 民族出版社, 1998.
- [5] [日] 平野谦. 灰暗的漱石[J]. 艺术和生活, 1956, (3).
- [6] [日] 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M]. 日本东京: 岩波书店, 1966.
- [7] [日] 三好行雄. 漱石的反近代[J]. 国文学, 1984, (7).
- [8] [日] 佐藤泉. 漱石 理不清的“近代”[M]. 日本东京: 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2002.
- [9] [日] 夏目漱石. 心[M]. 日本东京: 岩波书店, 1984.

(责任编辑 何良昊)

The Dusty Heart and the Way to Uncover the N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of Natsume Soseki's Kokoro and Hsun Tse's Philosophy

WU L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U Lu-e (1954-), fe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Japanese neoteric literature.

Abstract: Natsume Soseki vividly demonstrated Hsun Tse's Philosophy of Uncovering the Nature of Objects in his later novel Kokoro (the heart of things), pointing out that real spiritual freedom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sincere reflection and life revelation and by self-reproach in a sense of contrition. And it's not difficult to discover the implied condemnation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the author's anxiety for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The novel is a reflection of the mental journey of self-verification, self-reflection and end-result finding of the neoteric Japanese intellectual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country undergoing sharp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Natsume Soseki; Kokoro; philosophy of uncovering the nature of objects